

《尚书》史话

SHANG SHU SHI HUA

马 雍 著



K221.49/1

《尚 书》史 话

马 雍 著

DA7436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6579

中华书局

1982年·北京



886579

《尚 书》史 话

马 雍 著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 3 印张 · 54 千字

1982 年 1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7,000 册

统一书号：11018 · 1053 定价：0.26 元

前　　言

写这本小册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有志于研究《尚书》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介绍这部古籍本身流传所经历的复杂历史。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历史文献，其中保存了若干殷周时代的历史文件和原始材料；对于研究先秦史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必读书。但是，这部重要的史籍素以文辞古奥难懂著称。不仅如此，而且，从先秦到唐代，这部书的版本和内容经历了多次的变化和曲折离奇的历史，其中已掺进了不少伪造的篇章。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尚书》基本上是唐代的定本。从宋代以来，又经过许多学者的怀疑、辨伪和考订，才分清其中的真本和伪品。因此，一位读者在阅读《尚书》之前，应当首先对《尚书》的版本流传史具有相当的了解。但要对这个问题具备清晰明确的知识并非易事。《尚书》的历史是我国学术史上著名的难题，非常复杂；有关的原始报道矛盾交错，后代学者的论断异说纷纭；许多重大的问题迄今没有获得圆满的解答。

笔者在这本小册子里力图用通俗的直述方式把这些问题向读者交待明白，在一些有争端的地方，不可能详列众说，而只能采用笔者本人的选择。但是，不可避免地还要作一些简单的考据工作。而且，在几个重要问题上，笔者也大胆提出

了前人所未曾发表过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笔者相信《尚书》今本中的伪造部分并非同一时候出自同一人的手笔，而是先后出现过两次伪本，才形成今本的全貌。因此，这本小册子亦不仅供青年初学者之用，专门从事研究《尚书》的学者或许也会对它感到兴趣。笔者希望本书中所提到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得到各方面读者的指正。

本稿写成后，曾承刘起轩同志提过不少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马 疆

一九八一年八月于乌鲁木齐客寓

目 录

前言	(1)
小引	(1)
一、《尚书》的前身和今古文讼案的兴起	(5)
二、今古文《尚书》的并行和演变	(24)
三、今古文《尚书》的相继失传和伪《孔传古文 尚书》的代兴	(39)
四、《尚书》的辨伪工作	(60)
五、今天所见到的《尚书》	(75)

小 引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古国之一。我国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就是《尚书》。

《尚书》又名《书经》，也可以简称作《书》。古人往往把《诗》、《书》并称，指的就是《诗经》和《尚书》。他们在引用《尚书》的时候，通常只说“《书》曰”或“《书》云”。但因为用《书》来专指《尚书》容易和一般书籍发生混淆，所以这个名称现在已不通行了。至于《书经》的称号是由于后人把《尚书》列入儒家经典之内而来的。《尚书》是我们今天所习用的一个正式名称。

这部书为什么会叫做《尚书》呢？后代学者在解释这个名称时都认为“尚”和“上”是同义通用字，《尚书》就等于《上书》。可是，对于这个“上”字却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上”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于“君上”的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这三种说法似乎都不能使我们感到充分满意。此外还有一些别的说法，更加牵强，我们就一一介绍了。

《尚书》的内容：大部分是古代帝王们向臣下或民众所发表的训令和向军队所宣布的誓师词，以及大臣们向君王所提出的建议和规劝；小部分是关于远古历史的传说。这是一部历史档案汇编，它包括了许多篇不同时代的史料。它所涉及的时代，上起唐、虞，下迄春秋前期，为时至少约一千三百多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至公元前7世纪）。但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尚书》中的文献资料并不完全是真实可靠的原始史料。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直接的档案文献，另一部分是后代人所追叙的古史传说，还有一部分是时代更晚的人故意伪造的作品。究竟哪一篇是可靠的最古的档案文献呢？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就目前的一般看法而言，其中最古的真实史料是记载殷王盘庚迁都的《盘庚篇》。《盘庚篇》并不一定就是盘庚时期的作品，它可能是时代稍晚的史官所写的，但基本上是一篇真实的纪录，所以也应当被视为原始的档案文献。这篇档案文献的写成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上半期。^①它由人们口传笔录，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我们近代考古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字以属于盘庚时期的为最早，而《盘庚篇》正是与最早的甲骨文字时代极为接近的珍贵史料。因此，我们可以说，《尚书》中所保存的最古的档案文献，其时代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

保存这样古老的史料的书籍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我们知道，古代埃及的《死人书》中最古老的材料见于第五王朝的·

^① 《书序》认为《盘庚篇》是盘庚当时的记录，而《史记·殷本纪》则认为它是盘庚的儿子小辛时期追记的作品。但无论盘庚或小辛都是公元前十四世纪上半期的殷王。

金字塔中，时当公元前二十六世纪；虽比《盘庚篇》早一千多年，但那只是极为零星的宗教咒文，其价值远远不能同成篇的档案文献相比。古代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编于公元前十八世纪，比《盘庚篇》只早四百年左右。此外，如古代以色列人的《圣经》中最古老的部分是公元前九世纪的作品，古代希腊人的《荷马史诗》是公元前八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作品，它们都比《盘庚篇》要晚五、六百年。至于古代印度最早的史学作品《古事记》中最古老的材料始于公元前六至四世纪，时代就更晚得多了。何况，上述这些以古老闻名的典籍虽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都包含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荒唐无稽的内容；而《尚书》却保存了许多公元前九世纪以前的正式档案，是真实、朴素、严肃的纪录，没有神话的成分。由此可见，《尚书》在全世界著名的古老文献中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要想对祖国上古的历史具备基本的知识，《尚书》是一部必读的书。可是，谁都知道，这部古书是很难读懂的。两千年来，数以千计的学者对《尚书》下了不少的钻研功夫，写了许多详细的注解，考证了许多复杂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迄今仍然保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争端，仍然有一些无法解答的疑难，甚至对书中某些词句还不知道究竟应当怎样标点句读。

为什么《尚书》会这样难读呢？当然，首先因为它的时代太古。它所记载的是两三千年前的语言，在语法和词汇方面都与秦、汉以后的古文有所不同，和我们今天的语言距离更大，所以很难理解。其次，因为《尚书》原本是用先秦时

代的古文字写下的。自秦朝以后，我国文字经过几度变革，《尚书》自然也经历了各种字体的转写。在转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认错或写错的情形。当没有发明印刷术以前，又很难固定一种标准的版本。所以，古代的《尚书》各种本子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分歧，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尚书》已经远远不是原来的面目，所以对于某些颠倒错落之处无法纠正，当然也就造成了阅读上的困难。

然而，《尚书》的问题并不止此而已。这部书本身曾经有过一段离奇曲折的历史。《尚书》原本据说在秦末一度遗失，到西汉初年出现了一个残本，不久，又出现另一个残本。前者被人们称为“今文《尚书》”，后者被人们称为“古文《尚书》”。但到了晋朝以后，忽然得到了一个来路不明的本子，这个本子竟取代了早先流传的“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而成为唯一通行的定本，一直保留到今天。可是，经过后代许多学者的研究，才发现这个定本《尚书》中原来有一部分是后人伪造的作品，于是又把这一部分称为“伪古文《尚书》”。关于“今文”、“古文”、“伪古文”这些版本上的问题非常复杂，它是我国学术史上纠纷最多、争端最大、最富于传奇性的一桩公案。

我们在阅读《尚书》以前，对于上述各个方面应当具备一点基本的知识，特别是对于这部古典文献的历史应当略有所知。

一、《尚书》的前身和今、 古文讼案的兴起

历史记载是随着文字的发明而产生的。当人们有了比较定型的文字以后，不仅能随意写下自己的语言和当时的事件，还能追记过去的口头传说，历史文献就这样开始出现了。我国文字究竟起源于什么时代？这个问题目前还是一个谜。近代考古发现的最古文字是殷墟甲骨文，这种文字结构复杂，相当成熟；决不是原始的文字。根据甲骨文可以推断我国文字的起源必定早在殷代以前，至晚是在夏代。既然在殷代以前早就有了文字，当然也就有了成文的历史记载。不过迄今还没有被我们发现罢了。

我国在很古的时候就有了专门记载历史的史官，古代史官所记载的历史文献在体裁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按着年月次序逐条记录国家大事的“编年史”；另一类是记录国王和大臣们有关国家大事的言论和政令的档案。《尚书》就是后面这种档案文献的一部汇编。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保存这样成篇的文献，我们不能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殷代已经建立了保存档案的制度。西周初年的周公旦曾经说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①，所谓“册”、“典”就是指保存的

① 见《尚书·多士》。

档案文献而言。《尚书》中所保存的殷代文献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周代接收了殷代的历史文献，并进一步发展了史官制度。当时，在中央王室和诸侯各国都设有史官，史官之中更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等分职。这些史官除了记录当时的事件以外，当然还要负责保管旧有的历史档案和整理古代的历史传说。历史档案愈积愈多，每篇都得有个篇名，例如，记录盘庚迁都时告谕臣民的文献就以《盘庚》为篇名。同时，为了使用方便，史官们便把属于同一时代以及涉及那个时代的文献编在一起而以朝代作为区别，这样就产生了《夏书》、《商书》和《周书》。其中的《周书》收纳当代的档案，内容当然陆续有所增加。这些按朝代分编的历史文献汇编大约就是《尚书》的前身。

这种分编的形式可能出现于西周时代。到了春秋时期，它们已经成为贵族们所熟悉的读物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文化事业日益发展，当时的贵族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学习历史和政治理论来应付实际的活动，于是，这些历史文献汇编便和《诗经》一同成为知识界普及的课本，其中的词句经常为人们所引用。他们在引用这些文献时，或直接举出某篇的篇名，或只称之为《夏书》、《商书》、《周书》，或笼统地称为《书》，这只是各人引书的习惯不同。看来，在那时候还没有将这些历史文献合编成一部定型的总集。

春秋末年，儒家的始祖孔子在整理古籍、提倡学术和普及教育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他经常和弟子们讲论《诗》、

《书》，使这些文献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正因为这样，后代的儒家才把《尚书》奉为经典。也因为这样，后代人对孔子和《尚书》的关系才产生一些牵强附会的传说。例如，从西汉以来，就有人认为孔子曾替《尚书》写过《书序》，认为现在《尚书》每篇前的《小序》就是孔子写的。又有人认为原有的《尚书》包括三千多篇，被孔子删掉了其中绝大部分，只保留下百来篇。这些传说曾长期流传于学术界，成为传统的说法，但实际上都是不可靠的。因为，在孔子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编成定本的《尚书》呢！

在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时期，各家学者的著作都曾引用过这些历史文献，如《墨子》、《管子》、《孟子》、《吕氏春秋》、《荀子》和《韩非子》等书都直接引过《书》中的词句。这些引文有的见于今天的《尚书》，有的不见于今天的《尚书》，有的和今本《尚书》中的词句大同小异。它们虽然只是片言只字，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秦时期这部《书》的本来面目，所以具有珍贵的价值。先秦人在引用《书》以外，还引用另一种历史文献，称之为《传》，这种《传》似乎就是“传说”的意思。先秦人对于《书》、《传》分得很清楚，大约因为前者被认为是可靠的档案文献，而后者只是后人记载的历史传说而已。可是，《书》和《传》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人们有时也把《书》称作《书传》。^①

^① 后人把解释“经”的“注释”称为“传”，其意义与先秦人所谓的《传》不同。如《孟子》谈到有关舜的故事时说：“于《传》有之”，这种《传》显然是指记载历史传说的书籍。又《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所谓《书传》即指《尚书》，与后来称解释《尚书》的“注释”为《书传》者不同。《书》、《传》合称，大约即因二者关系密切的缘故。

《尚书》的定本究竟是在什么时代才编成的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不能提出十分确切的答案。但根据《尚书》本身所提供的线索来看，它的定本很可能是在战国末期出现的。因为，《尚书》中的《尧典》和《禹贡》等篇关于唐、虞和夏禹时期的记载与战国中期以前所有关于上古时代的传说都不大符合：其中所体现的是大一统国家的观念，而且表现得十分具体，象那样具体的大一统观念至少应当是战国晚期的人才会具有的；同时，这几篇中还涉及一些地理知识和地名，根据历史事实来考察，这些地理知识和地名也只有到战国晚期才会被人们所知道。既然《尚书》的定本中已经收进了《尧典》和《禹贡》这样晚出的文献，当然也就说明这个定本的编成年代不得早于战国晚期以前。最早编成的《尚书》定本究竟包括了多少篇，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它仍然将各篇按朝代分编，并且保留了《夏书》、《商书》、《周书》等类目。《尚书》定本编成以后，就有一些专门讲授它的学者相互传习。虽然一般的知识分子也能引用其中某些篇章的词句，但要全面读懂它就非依靠专家不可。

《尚书》定本编成以后不久，秦始皇就统一了全国，并且在当年（公元前221年）颁布了统一文字的命令，以秦国所定的小篆为规定的标准文字，此后又创了一种比较简便的隶书作为日常通用文字，而取缔了先秦时代其它各种不同的字体。《尚书》原来是用先秦文字写的，它经过统一文字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据我们推测，秦朝官方所用的《尚书》想必配合统一文字的命令而用隶书改写过了，但是民间所藏的《尚书》却未必全用隶书改写。因此，秦朝统一文字之

后，很可能使《尚书》产生了字体不同的版本。到了秦始皇晚年，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下了焚书的命令。命令规定：“非博士官所职（掌管），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① 统统要把书烧掉。经过这次焚毁，凡是用先秦文字所写的《尚书》原本差不多全部被消灭。能公开保留的只有博士所掌管的《尚书》，这些《尚书》当然都是隶书改写本而不是它的本来面目了。

此后不久，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的统治，接着又发生楚、汉战争，一连打了七、八年仗。这时候，山东济南有一个专门讲授《尚书》的学者，姓伏，名胜，人们都称他做伏生^②。伏生曾在秦朝中央担任过博士，他的手头保留下一部《尚书》。当楚、汉战争期间，济南地方一直兵荒马乱，伏生不敢留在家乡，只好逃往外地避难，临走以前，把他的《尚书》藏在家中的壁缝里。^③ 等到刘邦统一全国，建立了汉朝，社会秩序稳定以后，伏生才返回故乡，到老家的壁缝里去找寻那部暗藏多年的《尚书》。书，居然被他找到了，但遗憾的是，这部书已经损失了一部分，只剩下二十八篇。^④ 那二十八篇是：

一、尧典 二、皋陶〔yáo摇〕谟 三、禹贡 四、

①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博士是战国以来的一种官职，秦朝的博士没有定职，与汉朝五经博士不同。

② “生”是当时对读书人的一种尊称，与后代称“先生”相近。

③ 按照传统的说法，伏生是由于秦始皇下令焚书而藏《尚书》的。但许多学者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焚书令并不销毁博士手中的书，伏生既是秦朝的博士，当然用不着把《尚书》藏起来。所以我们认为，伏生很可能是由于躲避楚、汉战争而藏书的，这样比较合情理一些。

④ 关于伏生所找到的《尚书》的篇数，过去有二十九篇、二十八篇两说，争执颇多。但自从发现东汉末年石经《书序》残文以后，就确定伏生所发现的是二十八篇而不是二十九篇了。说详下。

甘誓 五、汤誓 六、盘庚 七、高宗肜日^① 八、
西伯戡黎 九、微子 十、牧誓 十一、洪范 十
二、金縢 十三、大诰 十四、康诰 十五、酒诰
十六、梓材 十七、召〔shào邵〕诰 十八、洛诰
十九、多士 二十、无逸 二十一、君奭〔shì式〕
二十二、多方 二十三、立政 二十四、顾命 二十五、费誓 二十六、呂刑 二十七、文侯之命 二十八、秦誓。

这时候，伏生年纪已老，一则记忆力减退，二则多年荒疏，对于那些遗失的篇文已经背诵不出来了，只好捡起这二十八篇在本乡传授门徒。伏生既曾担任过秦朝的博士，他这二十八篇书当然是用隶书转写过的；汉朝仍然沿用秦朝的隶书，所以伏生晚年讲授他的二十八篇《尚书》时，在文字形体方面没有隔阂和困难：于是，这个残本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②

可是，汉朝中央起初并没有重视保存古籍的问题。忽又过了二十多年，到汉文帝即位后，才开始注意整理文化典籍。象《尚书》这样重要的古籍，朝廷里既见不到书，也找不出能够讲授这部书的人。虽然在当时的大臣中，也有个别学者如贾谊等人能通《尚书》，但他们靠背诵记得其中的内容，偶尔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几句，手头未必有书，也未

① 彤〔róng绒〕，一种祭祀的名称。

② 学术界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伏生的二十八篇书原本是用先秦古文字写的，经他口传以后，他的弟子们都用隶书记录，于是才变成了隶书本。我们感到这一说法对于某些问题无法讲通，所以没有采纳。

必能作详尽的讲解。于是，朝廷多方打听，想找一位专门研究《尚书》的学者，最后才知道有位在民间传授《尚书》的大师伏生还活在人间。不过，伏生这时已有九十多岁，年老力衰，不能出门。皇帝只好命令兼管文教事务的奉常派属下一个掌故名叫晁错的^①到伏生家里去受教。伏生口授讲解，晁错用笔记下来，带回朝廷。从此，伏生所传的《尚书》残本二十八篇收进了皇家的书库，也就成了官方承认的定本。当时在齐、鲁一带开始有一些学者讲授《尚书》，他们都出自伏生一脉相传，所用的只是这一种本子。

随着汉朝前期社会经济生活的日趋繁荣，学术复兴的运动也逐渐展开。从景帝以后，朝廷鼓励民间献书，以前所未曾见过的残篇断简就陆续出现了。在《尚书》方面，首先发现了一篇《泰誓》。这篇《泰誓》也是用隶书写的，应当是秦朝官定本内的一部分。但因为它不在伏生的残本之内，所以没有人会讲解它。朝廷聚集了许多博士共同研究，才把它讲通。于是，将这本书加到伏生的二十八篇中，成了二十九篇。后人往往把伏生所传的《尚书》称为二十九篇，实际上其中的《泰誓》一篇是稍晚以后才掺进去的。而且，这篇《泰誓》和先秦人所引用的一篇《泰誓》文字很不相同，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也不清楚。但不管怎样，这篇来路不明的文献终于成了《尚书》中的一篇，在武帝初年已经被学者董

^① 奉常是汉朝的一个官职名称，其职务主要在于掌管宗庙礼仪，兼管一切学术教育事宜。后来改名为太常，但在文帝时始终称奉常，《汉书》记载此事竟称为太常，那是不准确的。掌故是属于奉常的一种官职。晁(cháo)，音与“朝”同，有的书上写做朝错，就是同一人。